

（第五十一輯）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四川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办编辑 黄天宝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年·成都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蒲其元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古蓉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6.125 字数 139 千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2147-X/K·282 印数:1-3080

定价:3.80元

目 录

张秀熟视察安县中学	王人泽(1)
沙汀在家乡	高一旭(4)
战士的风采	
——胡风在重庆琐忆	白 峡(10)
我的老师陈筑山先生	堵述初(16)
余沙园先生的书法艺术	余时敏(22)
罗承烈事略	杨鸿儒(28)
航运业专家童少生	省 民 建 省 工 商 联 (38)
范崇实与四川蚕桑事业	周海若 吴孟辉(48) 范谛真
一生革命 两袖清风	
——记辛亥革命英雄黄复生	黄三德(65)
成都造币厂史料	潘峻山(78)
成、渝两地照像业的发端	夏继虞(107)
盛况空前的动、植物标本采集活动	廖泽文(121)
回忆自贡市首届春节灯会	徐至诚(130)
四川袍哥	王大煜(139)
金堂竹篙剿匪记	周德远(164)
泸县卫生事业发展史料	刘志忠(173)

补充·订正·质疑·说明

读《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

组织——武德励进会》一文

后的几点不同意见…………… 陈雁 肇(181)

对《冯玉祥推动爱国献金的

川南之行》一文的若干商榷…………… 彭 兴(185)

补充…………… 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190)

张秀熟视察安县中学

王人泽

1956年中学语文教材内容改革(称为“文汉”分家)正在进行。是年秋,我们安县中学语文教研组同仁集思广益,研讨、定案、试讲、观摩,群策群力,终于完成了学校教材改革的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张秀熟赶来安县参加选省人民代表之机,组织一个视察小组,由他带队,偕绵阳专区主管文教的副专员韩文畦、绵阳专区文教科科长何鹏程等,在安县县委书记解满的陪同下,视察了安县中学。

视察那天,张老身着旧蓝呢中山装,头戴便帽。来校后,在学校办公室同余通灵校长、欧可成副校长、钟裕辉副教导主任叙谈不久,就到学校的每个地方这里问问,那里看看。如看到学校伙食团事务梁顺模老师办公的地方紧靠食堂,锅灶油烟终日薰绕,不仅影响身体,而且也干扰办公。张老责成刘生科长由科里拨款另盖一间事务办公室(即现在安中食堂教职工买饭的窗口处)。接着张老来到我们语文教研组(当时组内有吕朗如、陈灿然、吴定榕、陈抡元、黄克英、宋瑞兰和我共七位教师)。一进门,陈灿然老师便叫张老师,并给他让座,张老乐呵呵地与他攀谈起来,谈到在龙绵师范时的一些往事,真是情趣盎然,眼看着张老当时那种怀旧的缕缕情

思，言谈笑貌，真使我辈心情融融。紧接着张老又转过身问起吕朗如老师的眼睛情况，取下自己的眼镜交给吕老师试戴，并说：“你戴我的看看合不合适？”吕老师说：“我的眼睛视力太差，看书备课很吃力”。后来，张老又依次问我们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教书多少年，家中有多少人，经济上有没有困难等等。当时有些老师要上课，组上只有少数人。张老仍继续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久，张老商得学校同意，派一工人陪同吕朗如老师去医院医眼睛，配眼镜。这种洞察民情，关心教师的作风，为我校全体师生员工所称颂。张老来校期间，除听取学校情况的汇报外，抽空就下课堂听课。一次，张老听我的现代汉语语法课，讲的是：词组作句子的各种成份。下课后，张老给我的砥砺是：年轻锐进，逻辑严密。这句关怀和鼓励青年教师的话，竟会成为我大半生在语文教学事业上的推动力！

大约在张老视察学校的第三日，由学校教导处和语文教研组共同组织了一次全城关地区的中学文学教学的观摩课，选定初中三年级文学教材鲁迅的《故乡》一文，由陈抡元老师讲。《故乡》这篇传统中学文学作品课文，是鲁迅通过描写一个知识分子“我”回到故乡的见闻来揭示造成人们精神面貌的可悲变化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当时组上同仁正在研讨这个课的时候，张老和韩副专员亲临参加了这个会。讨论中，张老对讲这篇文章作了三点具体提示：

一、深冬回乡、冷风呼啸，荒村萧索的这一段景物描写。这些描写，是通过心灵体验来渲染着笔的。这样就使后来“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成了必然的归结。

二、游子归家。眼见家道中落，使悲凉的情绪更浓。

三、用对比法来描写童年时代的闰土和“我”以及过了二十多

年后的闰土，落笔于人物外貌。这说明外貌变化是精神变化的表现形式。张老这些中肯的建议，对观摩课教学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后来陈抡元老师在讲授这篇课文的时候，接受并采用了张老的三点建议，自己也作了一些发挥：如文章文句能琅琅上口；紧扣“以文见道，以道统文，文道结合”的原则；文章妙句，如“希望”一段等等。听课时，张老端坐教室，不说话，不抽烟，一直听完三节课。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能这样严肃认真地听讲课文，以一个普通一员出现，这种精神境界的确是很高的。当晚，召开观摩课的评议会，由教导主任钟裕辉主持，张老、韩副专员、何科长、刘科长、安中几位领导、语文教研组全体教师以及城关一小高年级部分语文教师均到会参加。当时张老坐在会议桌首端，怡然地边喝茶边抽叶子烟，先是倾听着大家的发言，直到大家都充分地发表了意见，张老才发言说：“我听了陈老师的这节课，我认为是一堂成功的文学课，教师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是不会作到的。教师从作品的语言文字入手，恰如其分地突出文章中的人物形象，这就是用“文”去指导学生挖掘作品内容，掌握基础知识并以此作为把握文章的基本手段，今后的文学作品课文就应该这样讲。”他发完言，接着侧过头去向坐在他右边的余校长说：“我的意见，可以把他提为高中教师。”这时已是时过午夜十一点，而张老仍精神抖擞，毫无睡意。评议会在一派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

沙汀在家乡

高一旭

群山环抱安州，汶江水润心田。沙汀就出生在青山绿水的安县。

沙汀书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笔名沙汀，生于1904年农历的冬月十三日。

沙汀的祖父杨仁和原住河坝场干河子的龙湾子（小地名），以农为业，善书法，有5个儿子，其子杨义质就是沙汀的父亲，后来迁居安县安昌镇。

杨义质是清朝末年的廪生，1909年病逝，在世时留下约50亩土地，一座院子。他妻子是一位能干的妇女，丈夫去世后，独立抚养两个孩子，后来将西街的房子全部卖掉，在城关附近买了一座水碾，苦心经营，维持家计。

1911年，沙汀已经7岁，母亲为了培养他俩兄弟，在家延聘老师教读。教过他的老师有四、五位，所读的有《三字经》、《千家诗》、《四书》、《五经》等旧学书本。1918年沙汀曾在安县师资讲习班上学，后舅父郑慕周从中江聘请老师到家教读，这时沙汀已进入青年时期。沙汀好学，进取心强。初时他的毛笔字不及同窗书友陈克坚写得好的，他就努力练习，发奋要赶上去，后来在短短一段时间里，终

于超过了陈克玺。他的学习毅力,求学好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为他后来取得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沙汀的舅父郑慕周长期追随袍哥大爷李丰廷。李丰廷与当时在安县一带自称独立司令的土匪头子陈洪绍(外号陈红苕)有矛盾。1916年郑慕周为李报仇雪恨,刺杀了陈洪绍。为防陈家报复,郑不便公开露面,沙汀就帮助舅父递送消息和运送手枪等武器,经常往返于县城和乡村之间,使沙汀接触了社会,对农村的社会生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1921年秋,沙汀通过舅父的私人朋友关系,进入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与在该校第十班读书的张君培和汤道耕(艾芜)同班。沙汀在张君培的帮助下,努力学习英文,并参加同学中的各种辩论。开始阅读《学灯》、《觉悟》等进步报刊。沙汀从僻远闭塞的山区城镇来到成都,第一次接触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看到了全国和成都学生掀起的反日示威游行,焚毁日货,他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示,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沙汀在省一师学习期间大量阅读了《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小说月报》、《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杂志,还阅读了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等的作品,这些书籍大大提高了他的思想境界,并对探索社会问题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4年沙汀20岁,和第十一班同学周尚明相识。周尚明是成都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任共青团成都市委书记。他在省一师读书期间,组办《钻声》壁报,团结进步学生,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沙汀和他都喜欢阅读鲁迅的作品和进步文艺书刊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书籍,也参加一些革命斗争活动。沙汀受周尚明的影响最大,他是沙汀走向革命的第一个引路人。

沙汀于省立师范毕业,不久即和同学谢荣华一道出川,准备报

考北大，因考期错过，又因所景仰的鲁迅先生已南下厦门、广州，故于初冬返川。沙汀在成都与周尚明相见，周尚明向沙汀讲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四川军阀的情况，沙汀受到很大启发，不久由成都返回安县。1927年春，沙汀经周尚明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他回安县工作，为了在安县建立党组织，沙汀又向组织提出要求，派高凌云（地下党员）到安县团务干部学校任政治教员，准备在该校发展党员。接着，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刘愿庵，以左派国民党川西特派员名义，派沙汀回安县组织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发展进步力量。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为清党举行登记，因此另派人接收了安县县党部筹备处。这时沙汀就转入了地下工作，筹建共产党安县支部。同年夏天经过组织批准，沙汀出任安县教育局长。任职后，他把一些把持乡镇学校的拔贡、秀才都统统免了职，换成了思想进步又有理想和才能的青年人和认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乡绅十分不满，甚至提出控告。这样沙汀趁与江油县教育局长对调之机，于当年冬天卸了任。

1928年沙汀去成都，向组织汇报工作。正遇上“二·一六”惨案，白色恐怖严重，周尚明同志被杀害，高凌云脱了党，沙汀暂时无法与组织联系，又才回到安县。不久绵竹农民起义失败，起义领导人共产党员王于青化装前来安县塔山乡与沙汀联系，商讨有关今后活动事宜，后因王患病，离开了塔山。沙汀再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这年由沙汀的舅父郑慕周捐资，沙汀主持扩建本县私立汶江小学校，郑慕周任董事长，沙汀作董事。该校的第一批教师均是沙汀聘请的。教员中有马芝祥、杨示宜、张禹林、曾学渊等，同时他还亲自与马芝祥老师一道编写校歌教学生唱。歌词是：“好哥哥、好弟

弟，一块儿同学习，趁一线光明，快些向前去，前途是无量，快些向前去，愿我们向前，愿我们努力。”还编了校训，制订校徽。校训内容是：“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们要养成为社会服务的能力。”校徽是五角星，五个角分别代表德、智、体、美、群。中间有一小圆，圆内有汶江二字。沙汀还亲自编写补充教材，如《志将酬》、《你何必发愁》等。汶江小学是安县传播文化、培养人材的重要阵地，同时是进步知识份子活动的中心。在抗日战争和反蒋抗暴斗争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在汶江小学扩建的同时，沙汀又协助舅父创办安县图书馆，先后数年，与张秀熟一道为图书馆购进了“五四”以来的文学和社会科学书籍 2000 多种，成为川西坝子进步书籍较多、规模较大的一个图书馆，大大促进了安县文化教育的发展。现在安县图书馆的藏书多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大批珍贵的精神财富。

1929 年夏天，沙汀离开安县去上海，求学未成，遂与任白戈、杨伯恺共同经办“辛垦书店”。1935 年冬天沙汀母亲去世，他又从上海回安县奔丧，在安县期间曾去北川县山区生活过一个时期，搜集了不少的写作素材。这次返川对沙汀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他在《兽道·题记》中写道：“《航线》、《土饼》中的大部分作品，则多是凭一时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讯拼凑成的，写起来吃力”。“这一本……集子最末几篇，叙述了所有故事、人物的素材来历……，是我 1935 年回过一次故乡，重新接触了生活”。1936 年沙汀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 7 月 7 日，抗战爆发，沙汀从上海绕道回到安县，常住安县秀山小学。乡村小学沉闷、厌倦的生活与后方沉重、压抑的空气，高昂的物价，使他大吃一惊。当年春节后，他即去成都，这次接触大后方的现实，对他以后的创作启发很大。

1938 年 8 月，沙汀离开了家乡去延安。1939 年冬，沙汀离开延

安返回四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中共“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经组织安排，沙汀又回到了安县。沙汀常住睢水刘家沟、刘家酱园、苦竹庵，继续从事写作。同年秋完成了《淘金记》这部长篇小说。沙汀的创作受到文坛的重视，被《现代》杂志称之为“一九三三年文坛上的新人”。

沙汀当年的创作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住处是三面篾壁的草房，以木柜当书桌。写饿了就自己动手煮饭，一面煮饭，一面喝酒。身体疲倦了就到屋外做一做操，爬爬山，总不忘打一罐子泉水喝，即使下雨也是如此。每逢场期他还托人从在睢水小学教书的妻子黄玉顺、岳母黄敬之处捎回一些报纸，看后就一火焚之。开初附近的农民听说他是“躲事”来到这里的，有些怀疑，日子一久就知道他既有学问，又很“本分”，怀疑的眼光变成了亲切的关怀，觉得这个人很好，有什么疑难费解的事，都愿意请教他。春节到来。他就在从延安带回的皮袄上扯下一撮羊毛做成笔，给农民们写春联。农民们以心换心，邀请他共尝春酒。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情真意切。

沙汀在那段时间，生活清苦，吃的是稀饭、盐菜之类，喝一点素酒。加之又患了胃出血，没有药医，房东就把吐出的血用瓦片炕干碾碎，兑白开水给他吃，病势严重时，还喝过童便。后来才到绵竹的拱星、河清乡以及僻远的永兴乡治病，之后又回到板栗园一边养病，一边继续创作。从1940年到1948的8年时间里，他写出《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三部长篇小说，还写出了《在其香居茶馆里》、《奇遇的旅程》等30余篇短篇小说，和《向生活学习》等十余篇评论、散文、序跋等文章。

沙汀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小说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点。安县人民读后感到十分亲切，因为小说中的人和事件，人民群众都很熟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写出了人民群

众想说的心理话。他的一言一行，为人处事，安县人民都感到十分亲切，至今难以忘怀。特别是在那艰苦的岁月，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身患疾病，还继续坚持革命，为人民写作，他这种以文学创作为革命事业、为人民利益而呐喊的忘我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敬佩的。

战士的风姿

——胡风在重庆琐忆

白 峽

诗人、文学理论家胡风逝世两年多了。他的形象并没有因岁月的拉长而遥远起来，反而越来越清晰，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似的。

胡风是湖北人，1925年曾进北京大学读书。可是这个学府并不能使他的灵魂安定，第二年转入清华大学。这时中国南方的革命之火在燃烧，于是他驰向南方。到了南方，他仍在矛盾中。正如在他的自传中说：“在革命的环境中间，我还一面写着忧郁的诗。”两年后，他到了日本。这时日本的文化革命运动，正蓬勃地发展，他参加了日本的革命文化斗争。这场斗争对胡风十分重要，用胡风自己的话说：“从那里我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对于文艺的新的理解和新的感受。这时候我才解除了社会观和文艺观的矛盾，从忧郁的情网里跳了出来。”

1933年春，他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拷打，然后被押解出境。他到上海后，便参加了鲁迅先生所领导的左联文艺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他创办了文艺杂志《七月》。

上海沦陷后,1937年10月《七月》在汉口复刊。汉口沦陷后,这个刊物又于1939年5月在重庆复刊。

笔者在本文中所回忆的则正是他在重庆所从事的文学活动。

1940年5月,诗人贺敬之、李方立以及青年木刻家程芸平等四位同志,积极准备去延安。他们住在梓潼县南门一家马店里,为了避免三青团的注意,他们白天都不上街办事,躲在马店里读书看报,这时最能吸引他们的是这年3月胡风在《七月》上发表了的《诗和田间底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胡风回答杨云连的信。杨云连在给胡风的信上指责田间的诗:“拘泥于简短的形式,……吝啬诗句底容量。”同时胡风还听到另外批评的意见,说胡风过分偏爱田间,对田间评价过高。……胡风对这些意见作了总的回答,写成《诗和田间底诗》。当时,李方立捧着这本杂志高声诵读文章中的警句:“第一,我没有把田间当作一个完成了的了不起的诗人看待;第二,我没有先从形式上去看田间底创作特性,他的形式,我再斗胆地说一句吧,他底带着天才光芒的形式正是从他的诗心和生活道路以及结合强度这上面产生出来的……”最后,胡风又说:“再让我斗胆地说一句罢,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底灵魂的战斗诗人和民众诗人,他在这一工作里面是有使他的生命发展的可能的。……”

听了后,我们都高兴地笑了。胡风的论点激励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前进,在诗的探索上敢于迈步,敢于创新。

几天后,诗人贺敬之等便离开梓潼去了延安。

1942年,我在梓潼国立六中师范部毕业,于同年到中江县作小学教师。这时,我也学着田间式的跳跃的句法——写我流亡路上的流民图——也算写一群新的战士。

贺敬之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写了组诗《跃进》,李方立也写了诗(后来他的诗发表在桂林1941年的《诗创作》上),贺敬之把组诗寄

给梓潼的同学白莎，然后由他转寄给重庆的胡风。不久胡风便在他编的《七月》上发表了。贺敬之的诗发表本来不容易，因为国民党的图书（包括杂志）检查机关要审查原稿。贺敬之诗的末尾又注明写于1940年去延安的路上，诗中又有这样的句子：

紫光/照亮了西北的路，/照亮了他们的歌……，/还有/……/
1940年/走出那狭窄的/低沉而暗哑的门槛，/……不回头/那颓废
的小城，/忘记/那些腐蚀的日子……，/……^①

这样的诗在蒋介石统治的大后方发表了，这是胡风大智大勇的表现，他是在国民党的图书检查机关审查了《七月》全部稿件后，杂志付印前才把《跃进》这组诗加进去的，如此便躲过了审查官的眼睛。

《七月》是1939年5月在重庆复刊的，复刊困难重重。胡风在复刊后第一期编后记中说：“由上海移到武汉，在半个月里能复刊，那不能不感谢友人熊子民、余宗武，没有他们的助力，《七月》也许根本不能存在。”《七月》在重庆复刊“经过了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复刊，当然也由于友人底助力，但这只有到再一次复刊或者简直废刊的时候再来表明我的谢意罢。”在重重困难面前，胡风壮心不已，他不怕困难，在《七月》复刊预告里，曾说“同时要在金华印发，发行在中国东南一带，在上海印发，发行在南洋一带，并在重庆和金华编印两个大众版”。可是重庆的政治压力太残酷了，当时环境像辛弃疾词中所描绘的：“昨夜浓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他根本无法实现在重庆和金华编辑《七月》大众版的计划，仅“大众”两个字在当时检查机关眼里就带着恐怖色彩，他们打击这样的刊物是不择手段的。

重庆图书新闻检查机关成立于1939年初，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潘公展，他出身于绸缎店，用胡风的话说：“因为他是老手，做起来